

唐、宋时期甘肃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

何双全 谢晓燕

(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从汉代的丝绸之路到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古代甘肃在各个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唐宋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在甘肃地区与藏族之间进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宋时期甘肃境内茶马互市的基本情形、形成原因以及茶马古道在甘肃境内的线路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甘肃;唐、宋时期;茶马互市;茶马古道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8-0005-06

茶马贸易作为历史上农牧民族之间在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等省边界地区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一种贸易往来,从唐、宋至明、清延续长达千年。这种关系不仅在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上西北地区是农牧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带,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互补是该地区的一种特色。特别是丝绸之路贯通以后,西北地区不仅在经济方面地位格外重要,而且军事战略地位也十分显著。所以,“古代西北在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正因为如此,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主要发展于我国西北地区。

唐代是继汉代以来又一个昌盛的朝代,这不仅表现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上,更体现在西部民族关系的融洽、经济的繁荣等方面。唐时甘肃分属陇右道、关内道、剑南道、山南西道,涉及22州、67县,主要分布在河陇地区。从唐代开始,藏族开始强大起来,成为甘肃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唐、宋以后,藏族一直同中原保持着紧密联系。因此,唐、宋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是在甘肃地区与藏族之间进行的。

至两宋时期,周边民族政权林立,环境复杂,但是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因为传统统治区域的缩减而低于唐代,其在唐代茶叶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生产区域,因此,茶马互市活动在甘肃地区大规模地开展也正是在北宋时期。除了互通有无的商贸含义之外,还具有政治、军事等多方面意义在内。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甘肃境内唐、宋时期茶马互市的

基本情形、形成原因以及甘肃境内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及其线路问题加以简单论述。

一、唐代甘肃的茶马互市

在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其间既有政治军事对抗,又有经济贸易交往。马匹不仅是双方贸易的重要物产,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军备物资。拥有马匹数量的多少,与国势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历代王朝都很重视马政。而西北少数民族的畜牧业十分发达,牧养着大量马匹,一向是中原战马的重要来源。自汉以来,中原王朝都很重视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以丝织品和马匹为主的各种贸易往来。在唐代茶马贸易出现以前,历代中央王朝主要以丝织品来交换西北少数民族的马匹,这种交易就是绢马贸易。绢马贸易曾是农牧民族之间进行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

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贸易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唐代茶马贸易出现以前,贡赐贸易作为农牧民族之间经济交往的另一重要形式在西北民族贸易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不完全统计,安史之乱前,西域前来唐朝的朝贡多达170余次”,从中可以看出这种经济交往形势之频繁。

绢马贸易与贡赐贸易的共同推动,加之唐代本身综合国力的强盛以及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繁,各方面形势都要求进一步加强唐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这种形势下,茶马贸易便在绢马贸易和贡赐贸易的基础上出现了。

茶马互市究竟开始于何时,因史籍记载不详学界

尚有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元731年唐蕃赤岭互市,就进行了茶马贸易;另一种观点认为,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壬申,盐铁使王明奏:“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得铜钱,翻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其它物市马。”

分析以上三种观点,茶马贸易始于唐开元十九年(731),这种观点其实和第二种观点“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在时间上相差不是太多,惟在茶马贸易的对象存在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茶马贸易首先始于唐与吐蕃之间,而第二种则认为首先始于唐与回纥之间。第三种观点在史籍上有明确记载,但在起始对象上有学者认为是宋与契丹之间,这一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因为在盐铁使王明奏言中,其中的“戎人”指的并不是契丹人而是党项人。

目前学界大多持第二种观点。这种说法最先出自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按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盛,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其后,封氏的这种说法被《新唐书》及以后的《文献通考》等史籍沿用。明代对西北茶马互市做出重要贡献的杨一清也认为:“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这种说法更被清代学者所接受。《旧唐书》卷49《食货志》载:“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正月,初税茶。”唐代从此开始把茶税固定下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把茶叶经济正式纳入国家正常运转轨道,且自税茶以来,随着茶叶生产的不断发展和茶税的增加,茶税收入已超过盐铁收入,成为唐朝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使之得以有条件以茶叶代替绢及其他物品支付马价。因此,在唐代中叶“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唐代甘肃的茶马互市并没有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绢马贸易在各民族贸易交往中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

在绢马贸易中,回纥是唐与少数民族市马贸易中最大的供应方。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回纥有大量牧马的优势,但其却没有作为华服衣料和进行转手商品贸易的绢帛;另一方面,此时唐的局势不安,正急需马装备骑兵,以稳定王朝局势。这种情形,就成就了唐与回纥之间极为紧密的绢马贸易关系:

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归其马价

绢五万匹……八月,其马价物,且付十二万匹。

贞元六年(公元790年),赐马价绢三十万匹。八年给市马绢七万匹。

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以绢十万匹偿回纥之马值。十二月,以绢九万匹,偿回纥之马值,十二年二月以内库绢六万匹偿回纥马值。四月以绢二万五千匹,偿回纥之马值。

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以绢五万匹,充回纥马值。四月,赐回纥马价绢七万匹;十二月以绢八万匹偿回纥马值。^⑪

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三月,内出绢二十万匹赐回纥充马值;六月,以绢二十万匹,充回纥马值。^⑫

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赐马值绢五十万匹。三年以绢二十三万匹赐回纥充马值。四年以万匹互市。^⑬

分析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唐与回纥双方市马之频繁。回纥之马只能大宗卖给唐这个大市场,他们所需要的绢帛也只能从唐朝去买而别无来源。这样双方以有易无,一方得马,一方得绢,各获所需。然而通过以上史料,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中唐政府财政负担之重,这里已远超出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其中包含了更多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因素。

此外,在西北地区民族贸易中,唐与党项族所进行的互市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新唐书》卷114载:“党项互市羊马,类先遣帅守,(崔)从独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盗境。”在这则材料中,通过唐代政府为保障双方互市的顺利进行而派遣军队维持秩序的史实,可以看出政府对双方互市的重视程度。

从唐代开始,藏族开始强大起来,成为甘肃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吐蕃与中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吐蕃遣使至唐曾达125次之多,双方通过贡赐手段互通有无。吐蕃曾多次请求唐政府在沿边开互市以便贸易。茶马贸易出现以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汉藏茶马贸易占据了绝对优势和地位,然而汉藏茶马贸易在唐代却规模不大,二者之间在这个时期大都是贡赐贸易或者互市。

唐代的甘肃在与各少数民族的贸易交往中拥有绝佳的地缘优势,唐代政府对与少数民族互市之重视,唐代政府对马的需求特别是在王朝中期以后又是非常急

迫,且自从唐代把茶税列为国家财政收入、把茶叶经济正式纳入国家正常运转轨道以来,已完全有条件以茶叶代替绢及其他物品支付马价。然而,为什么茶马贸易尤其是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却并没有因此而唐代的甘肃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其原因:

首先,饮茶之风尚未在少数民族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茶马贸易。茶叶在唐代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正是在这种饮茶之风的影响下,开始逐渐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蔓延,然而尽管如此,茶叶还只是仅供其上层享受的奢侈品,少数民族的普通民众无法轻易享受到茶叶,这种状况便决定了其在茶马贸易刚开始的唐代对茶叶的需求量不是很大。这一点是茶马贸易尤其是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在唐代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

其次,唐代对马政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马贸易。唐代初期十分重视马政,设有监牧之制,对马匹实行严格的登记管理。初唐时期政府拥有的马匹数量很高,“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⑭从贞观到麟德二年(665),马的数量达到了70.6万匹。西北地区因其自然地理条件的优越成为唐代官马的主要孳牧区,唐在泾、宁等处设置八坊,共有田地1230顷,募民种草作为马匹的饲料。由于马的数量不断增加,八坊之地有些狭小,又把八坊分布在更为广阔的河西地区,马的价格也随之下降,“天下以一缗易一马”。^⑮开元初年(713),政府还鼓励私养马匹并限制官吏私蓄马匹。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初期的茶马贸易形成了制约。

再次,唐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茶马贸易的规模。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主要以羁縻、怀柔为主,如互市、和亲、册封、朝贡等。以吐蕃为例,采取的便是和亲政策,与吐蕃建立了舅甥关系。唐时的民族关系格局不如宋时紧张,为显示其大唐气象,唐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首先看重的是义而非利,即便是与少数民族进行经济方面的交往也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之上,而是采用“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⑯的方针。在这种情形下,茶马贸易不可能大规模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茶马贸易在唐代的甘肃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是因为还不具备大规模发展的条件,所以,茶马贸易在与各民族的贸易交往中也无法占据主要地位。正是唐代在各方面的积累,为宋代茶马贸易的大规模兴盛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宋代甘肃的茶马互市

两宋时期是一个民族矛盾尖锐、政权分立的时期,西北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北宋前期,其疆域仅及陇东和天水一带。这一时期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通过贡赐贸易、榷买等各种特殊的贸易交往活动,以较高的代价保持与诸民族的友好关系。这些贸易交往在表面上是一种贸易关系,具有商业性质,其实是一种政治外交关系,其中的政治意义远远高于经济意义。

“在宋辽金元时期,贡赐贸易是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及中亚、西亚等地的国家或政权与宋朝所保持的重要贸易活动。”^⑰在这种贡赐贸易中,贡马贸易比较兴盛。所谓“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同时,马在军事、交通等许多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功能,因而马政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关系军国存亡的大政。居住在陇右、河西之地的安多藏族,由于其自身力量薄弱,又面临西夏的威胁,只能依靠宋王朝作为依附,再加上向宋王朝进贡马匹可以获得超过所贡马匹的高额回赐。按照一般回赐的标准,所予回赐往往超过所赐物品的实际价值。因而自宋建国以来,安多藏族便开始向宋进行贡马。真宗咸平元年(998)十一月,河西军左厢副使一次性贡马多达2000匹;五年(1002),一次性贡马5000匹。北宋按一般回赐标准均“厚给其直”,所回赐之物的价值远胜于所贡之物。

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部族对朝廷的进贡络绎不绝,除了马匹以外,所贡物品种类也比较多样。这种形式的贡赐贸易有学者称之为“是一次大的展销,其中有来自当地的产品,也有来自西域各国的特产,他们通过秦州、熙州等中驿站后入贡朝廷,而朝廷所赐之物也是贡者所需的,通过物品的流通,可以达到各取所需,各受其利。”^⑱然而,即便是“各取所需”,可这样的“展销”毕竟给历代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且宋本身就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其每年财政支出的规模远大于其财政收入,为了减轻这一压力,宋朝政府愿意发展茶马互市。

宋代的茶叶生产水平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据研究者估算,北宋茶叶年产量在5300万斤以上。而在北宋全国人口中最高人数在4000余万人,按当时宋朝境内的人口及人均半斤的茶叶年消费量计算,宋朝所产茶叶的50%以上,即约二三十万斤茶叶都可以外销,供少数民族之需。且到了宋代,西北各少数民族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牧民,无不嗜茶如命,茶已经成

为少数民族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之物。

马市是宋朝在西北民族贸易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宋初,西北地区的原州(固原)、渭州(平凉)、秦州(天水)、德顺军(静宁)等地是汉、藏、党项等各民族贸易的市场,也是宋朝以茶易马的主要场所,每年买马数目高达3万匹以上。茶马互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贸易形式而成为各民族间贸易往来的主要形式。

神宗熙宁年间(1063~1077),宋收复了熙(临洮)、河(临夏)、洮(临潭)、岷(岷县)、叠(临潭县南迭部)、宕(宕昌)等州,并设熙和路进行管理。为安抚当地30多万帐藏族并获取战马,宋政府便把茶马贸易扩大到熙和地区。随着茶马贸易的日益扩大与兴旺,宋开始对茶马互市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有效管理。

据《宋史·职官志》、《文献通考·职官》等文献记载,熙宁七年(1074),宋在成都设置榷茶司,在秦州设买马司,分别对买卖四川茶叶与藏族马匹的事宜进行管理。元丰四年(1081),有人以茶司不能买马,买马司不兼茶务,二者不能密切联系恐误国事为由“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①此后二司便合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互市事宜。经过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刻意经营,使唐代以来业已存在的茶马贸易在宋代发展成为以茶马贸易为主的茶马贸易体制并且日臻完善。

据胡小鹏和魏明孔两位先生的研究,宋代甘肃地区茶马司经营茶马互市的主要办法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当时茶叶的主产区四川榷茶,规定所有茶叶都必须按官价卖给官府,然后把所买的茶叶运往熙秦地区出售换马。茶马司共在四川设置买茶场41处,在陕西(包括甘肃)设置卖茶场332^②处,在熙和路设置买马场6处,后又增设了熙和(临洮)、岷州(西和)、通远军(环县)、永宁寨(甘谷)等处买马场,以收茶买马。二是在四川到熙和路沿途设立水路茶递铺,招募沿途百姓并差发成都府路厢兵充当脚夫,以解决茶叶运输问题。三是鼓励商人贩运,商人在产茶州县向官府交纳茶价和税款后,就可以领到茶引(运销一定数额茶叶的专卖凭证),按茶引所规定的数量,把茶叶运到西北熙秦等地茶场卖给官府。四是严禁内地贩运私茶出境或私相交易,规定少数民族只许在官场买茶,违者除没收货物外,还要依法判刑。州县官吏监督不严的也要受到处分。政府用严刑峻法来控制茶马互市,以保证其在规定时间内正常运行。

茶马贸易在宋代较之唐有了很大进步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对贸易经营、管理的制度化及系统化上,特别是茶引制度的出台,使茶马贸易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

南宋时期,陕西熙秦(天水)地区被少数民族控制,西北买马场只剩下秦州买马司管辖的西和州宕昌寨买马场和阶州(武都)的峰贴峡买马场。从此,茶马互市的重点开始从西北甘肃地区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转移。然而,从唐代就已经出现的茶马贸易,为什么在宋代能够集中在甘肃地区并能够在甘肃地区如此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呢?

唐宋时期的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甘肃在与各少数民族的贸易交往中拥有绝佳的地缘优势,其位于黄河中、上游,东接陕西,南邻四川,西连青海、新疆,北靠内蒙古、宁夏并与蒙古接壤。从自然地理角度说,甘肃是农业地区和牧业地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错的地带;从历史角度讲,甘肃又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分界处。这些绝佳的地缘优势都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且自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移民屯垦以后,至唐代,甘肃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相当发达,加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文化的发展,甘肃已成为西北地区一颗耀眼的明珠,历代的互市地点有许多就设在甘肃境内。所以,在宋代,甘肃在各个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茶马贸易之所以在宋代能在甘肃地区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少数民族人们饮茶成风,对茶叶的需求量加大;同时,宋代茶叶的生产规模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有充足的货源。此时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无论是回纥、党项或是吐蕃,茶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吐蕃人,甚至到了嗜茶成瘾的地步,“茶不可须臾离,若潜制其命者”。^③

第二,宋对马匹的大量需求。宋代民族矛盾尖锐、政权分立,北部有契丹,西北有党项,以及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及西北的高昌、龟兹等政权,宋要稳定局势,与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无疑需要大量的马匹以巩固政权。另外,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单纯依靠国内监牧养马根本无法满足军事需要,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茶马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绢马贸易和贡赐贸易给历代政府造成极大的财政压力,原本就积贫积弱的宋朝政府愿意以茶易马,政府对茶马互市给予极大的支持。

第四,宋与吐蕃之间的关系是茶马贸易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宋代的茶马贸易,主要是在甘肃地区与藏族之间进行的。宋与吐蕃之间尽管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在共同对付西夏的问题上态度一致,即遏制西夏的扩张。这一时期,吐蕃对宋的贡赐交往也十分频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西凉吐蕃诸部向宋进贡达27次之多,其中马匹是主要的贡品。宋在收复熙和路以后,发现这里有大量马匹,而吐蕃诸部又嗜茶如命,随即在这里设立六个买马场并停办其他边州买马,将市马贸易的重心完全移至熙和路地区。

茶马贸易,双方各取所需,正如宋人所言,“熙宁以来,讲摘山之利,得充厩之良,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②这也是茶马贸易在宋代的甘肃地区之所以大规模发展的最好概括。

三、唐、宋时期甘肃的茶马古道及线路

茶马古道是我国古代的一条商道,其主要内容是茶马互市,即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茶马古道是我国唐宋时期西部地区汉藏民族之间传统贸易交往和经济联系的一条纽带,关于其线路问题学界一直比较关注,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但大都把目光锁定在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等地区的原始古道上,而对于甘肃境内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及线路问题的关注却相对较少,下文试就该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期补学界研究之不足。

唐宋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是在甘肃境内与藏族之间进行的。唐代的茶马互市尚处于开拓阶段,大规模的茶马贸易开始于宋代熙宁以后,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茶马古道应该是在此时才完全形成一条西北地区农牧民族之间贸易交往和经济联系的道路。

熙宁七年(1074),宋开始在今甘肃的平凉、庆阳、临洮、岷县、临夏、宕昌、武都、文县、成县等地设置众多的买马场和卖茶场,政府每年将四川地区的茶叶大量运往这些地区与吐蕃等部族易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当地的茶叶与吐蕃诸部交换马匹。茶叶开始向甘肃地区输入始于隋唐,大规模地输入则开始于北宋。

很多人研究茶马古道,多认为甘肃境内只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场所,而不是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片面和武断。茶马古道本身即起源于茶马互市,没有茶马互市也就不可能有茶马古道。唐宋时期的甘肃是茶马互市最为集中且大规模发展的地带,而甘肃不是产茶区,其在茶马贸易中

的茶主要来自四川。据《宋会要·食货》记载,宋代熙宁十年(1077)前设置的20个买茶场,都在成都府辖区的眉、蜀、彭、绵、汉、嘉、邛、雅等州境内。宋政府在四川设置买茶场41处,在西北地区设置卖茶场332处。在宋与各民族之间的茶叶和马匹的大量输入与输出中,必然存在一些茶马古道的重要线路。

四川与甘肃之间的交通道路,历史上较著名的有仇池道和阴平道,均是从渭水上游翻越秦岭西段和岷山,之后便沿白龙江河谷而下。仇池道从甘肃天水南过秦岭,经成县、武都、文县而与阴平道相接,再经四川青州、江油进入四川盆地,最后抵达成都。阴平道是由临潭起始,沿羌氏道经文县到四川的道路。而从成都经汶川、茂县通松潘去甘南的道路也曾经是连接四川与甘肃的一条古道,秦汉时期在这一带曾设置湍氐道、汶川道和绵虬道等专门管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行政建置。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十六国和北朝对中原和河西的控制,从江南到西域不能再走传统的丝绸之路干线,于是四川地区便成为东晋南朝与西域往来的主要通道。据《南齐书·州郡志》载:“益州……西通苻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这条道路在唐宋时期被称为西山道,是剑南与陇右地区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也是茶马贸易的一条重要线路。西山道在松州(松潘)分为两支,一支向西北经叠州(临潭县南迭部)、洮州(临潭)通河湟,与丝绸之路相连;另一支转向东北,经扶州(九寨沟)、文州(文县)、武州(武都)、成州(成县),至凤州(凤县)与成都去长安的故道相连接。

除以上道路外,还有一条古道在唐代后期和宋时相当繁荣,这便是当年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的唐蕃古道。其东起长安,经凤翔、秦州(天水)、河州(临夏)、鄯州(乐都),逾日月山入蕃。有学者认为该古道不是茶马古道,其与茶马古道两个概念只是在时间上同时存在,但它们的历史功用不相同。^③笔者以为此观点值得商榷。一条道路的形成,要经过开拓、修筑、改善以及习惯走向、运输利用等过程,道路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强的稳定性,特别是其中的习惯走向以及运输利用更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提高了道路的稳定性的。

唐蕃古道在其前期是连接唐与吐蕃的政治要道。唐蕃古道可以追溯到汉朝时,因为早在那时,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大道就已基本形成。到文成公主沿唐蕃古道进藏及金城公主嫁往吐蕃。此后,唐朝与吐蕃间使臣不断,吐蕃遣使至唐曾达125次之多,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就连藏族须臾不可离的茶叶也正是被文成公主

从此道带入藏区,带去了藏人饮茶的习俗。宋时,在茶马贸易的日益兴盛中,唐蕃古道便自然逐渐演变为汉藏茶马贸易的一条重要通道。

甘肃境内至今还有一些唐宋时期茶马古道线路的遗址被保存下来。如峰迭古城遗址,位于白龙江西岸的冲积扇上,宋代称峰贴峡寨,为茶马交易的故地,历经南宋、金、元而不衰;旧洮堡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城关区,因该地旧为洮州城,又称旧洮州城,明初改州为堡,故称旧城堡,简称旧城,相对于明洪武所建新洮州城而言。北周时期以其地置洮州,隋大业年间置临洮郡,唐贞观年间于洮州置临潭县,安史之乱后,吐蕃占其地,改成洮州城,宋时又改临洮为洮州。旧洮堡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汉藏茶马交易地,其与新城是洮州乃至甘南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之双子城,特别是明清时期,以新城偏重于政治、军事,旧城更重于经济、贸易,两处都曾设有机构管理茶马交易活动。此外,还有当年众多的茶马交易场所如平凉、庆阳、天水、岷县、临夏、宕昌、武都、文县、成县等地区,现在仍在各方面发挥着重要功用,其中天水在宋代就已经在茶马贸易的影响下发展成为10万户以上的大城市。^{②1}

从汉代丝绸之路的贯通到唐宋茶马古道的开始,甘肃因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在中国区域历史发展中始终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茶马古道本身更是产生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之下的一种特色文化,其不仅在我国唐、宋时期的民族贸易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推动了民族贸

易的极大发展,也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宗教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茶马贸易是农牧民族之间因区域生产结构不同而进行经济交往和贸易联系的一种方式,自唐、宋以来,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不容忽视。从上述对唐、宋时期甘肃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简单结论:

其一,唐、宋时期甘肃的茶马贸易经历了从唐代的初始阶段至宋代的兴盛阶段,在这其中,宋对茶马贸易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对唐代茶马贸易的简单继承,而是在充分开发利用并规范引导的基础上使茶马贸易尽可能的为王朝统治服务,客观上促进了甘肃地区的民族、文化、经济等诸方面的交融与发展。

其二,唐、宋时期的甘肃并不只是茶马贸易的重要场所,还是茶马古道重要线路的所在区域,曾经作为连接唐与吐蕃政治要道的唐蕃古道在宋代应该是茶马贸易的一条重要通道。

其三,唐、宋时期的甘肃,因为茶马互市的出现和茶马古道的穿行,使其在当时的区域经济、政治及军事战略格局中地位十分重要。

其四,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及茶马古道在当时甘肃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 释]

①魏明孔:《略述唐宋茶马互市的发展变化》,引自《西北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焦北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陈光国:《青海藏族史》,青海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①④⑤唐·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王晓燕:《关于唐代茶马贸易的两个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⑬晋·刘昫:《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⑪⑫⑬宋·王钦若、杨红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⑭闫贵荣:《浅议宋代陇右商业贸易》,《延安大学学报》,2007

年第12期。

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⑯“卖茶场332处”,魏明孔先生在其《略述唐宋茶马互市的发展变化》一文中认为是32处。此处引用胡小鹏先生著《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中《古代甘肃的茶马互市》一文中数据。

⑰张彦笃总纂、包永昌分纂:《洮州厅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⑱《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点政》卷256《山堂考索·论茶马》。

⑲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

⑳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